

颓圮的边界与生命的回响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小说

◎刘智跃 著

绪论：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文学语境

第一章 新时期精神分析文论的译介传播

第二章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

第一节 文学观念变革：出发与回归

第二节 创作心理审视：回溯与探幽

第三节 心理批评：重释与再造

第三章 感性生命：张扬与迷茫

第一节 生命之光与文学之源

第二节 性压抑与变态生命观

第三节 性偏至与本能生命观

第四节 性反抗与政治生命观

第四章 无意识主体：回归与失落

第一节 无意识探求与主体审美

第二节 个体与边缘

第三节 集体与象征

第四节 语言与分裂

第五章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小说的美学新质

第一节 美学现代性

第二节 无意识与潜本文

第三节 心理叙事美论

颓圮的边界与生命的回响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小说

◎刘智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颓圮的边界与生命的回响：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
小说/刘智跃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004-6896-7

I. 颓… II. 刘…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7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537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李 莉
装帧设计 周基东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2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朱 栋 霖

刘智跃研究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这是他当年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2003年刘智跃从长沙来到苏州，在方塔之侧，葑门河畔度过三年寒窗。三年一瞬间，工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拿出了一部有着深厚学术功力的博士论文专著。

智跃与江腊生、卢炜、李曙豪、金红、季小兵、张莉，是同一届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论文都与我所承担的国家课题《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相关，每人选择研究某一个西方现代文学流派或作家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关系。为了统一大家的学术思路，我每周一次给他们讲课，间或讨论，连续两个学期。讲课的总题目是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系统阐发我对重新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看法。这个内容就是2008年《学术月刊》第三期刊登的那篇论文，也可以说是我的“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论纲”。

从人的观念思考，从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考察，就重新发现了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意识流、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现代各种流派之于人的发

现、人的观念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就成了题中必有之义。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之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发现、人的观念的变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弗洛伊德的名字两度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人关于人的观念，向20世纪的中国人揭示了新的人性，过去被隐秘与压抑的人性。

早在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朱光潜、张东荪、余天休、吴颂皋、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都撰文给以介绍。根据潘光旦在霍理士《性心理学》一书的译序中所记，潘于1920年在清华学堂高等科求学时就读到精神分析学的这部代表作，1922年他接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他在当时梁启超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课上，以精神分析理论结合中国文献资料写出《冯小青考》（后于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近乎离经叛道的分析获得了这位国学大师的奖掖，称赞其“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潘光旦于1941年译出霍理士《性心理学》，1946年出版。而在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下的泛性论美学思想，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在中国文坛影响甚大。鲁迅的文艺思想就主张此说，厨川白村阐释精神分析学美学思想的《苦闷的象征》，这本书于1925年分别被鲁迅、丰子恺翻译出版两遍，可见其受欢迎程度。1925年鲁迅还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的另一著作《文艺思潮论》也于1924年翻译出版（译者樊从予）。此外还有《文艺与性爱》（日本松村武雄著，谢六逸译）于1927年问世。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厨氏的关于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理论，显然在中国新文学家那里大受青

睐。五四时期的郭沫若、郑伯奇、郁达夫等都认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从而构成了创造社的文艺自我表现说。而厨川白村进而将“苦闷”作了深入的开掘，提出“人间苦”、“社会苦”、“劳动苦”，这使无论强调“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艺术家都从“苦闷的象征”说中契近人生。鲁迅介绍《苦闷的象征》对精神分析学说大为推崇。新文学作家中，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知名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庐隐、白采、王以仁、冯至、陈炜谟、陈翔鹤、废名、叶灵凤、茅盾、沈从文、张爱玲，剧作家田汉、曹禺、陶晶孙、袁昌英、白薇、向培良、熊佛西等一大批人，象征派诗人、新感觉派小说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五四新文化的对于人的现代性思考和新的人学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性探讨的依据，显示出五四新文化对于中国传统理学人学思想的反叛与突破。

中国传统的儒家人学思想以社会人伦关系为核心，宋明理学的人学思想的中心是关于“天理人欲”的介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一直是宋明以来的理学主流思想。泰州学派王艮挑战正统理学的“理欲”观与思想道德信条，提出：“人性之体即是天性之体”，“身与道原是一体”。叛逆思想家李贽则明确提出：“人道即是天道。”他接过王艮的命题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理欲之辩”发展到清代，黄宗羲提出“心性合一”论；王夫之提出“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天理与人欲同行”，“理在欲中”，“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戴震更提出“血气心知，性之实体”的自然人性论，他充分肯定自然情欲观，“饮食男女，养生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他提出“理存乎欲”的理欲观。从梁启超“新民说”，严复提倡“物竞

天择”、“生物进化”思想，到五四讨论婚姻家庭、新道德、新性道德，其旨都在构建中国现代新的人学思想。而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深层精神分析的学说则为构建中的现代人学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现代理性的分析。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第二度进入中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是“使人不成其为人”。新时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文化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塑人的自我与尊严，呼唤、认同人性、人情，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实现人权。

它所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与十年动乱对人、对人性的全面践踏。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理论指导下，人被按照阶级性来界定、划分，近现代形成的以启蒙主义、现代人文主义、自然人性论为主体的现代人学思想受到全面排斥、批判，人性、人情，人的情感、情欲被压抑，文艺作品表现人性、人情成为禁区，“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成为经常挥舞的两根大棒，一旦被指为表现了人性、人情，作品与作者就会被打入另册与地狱。从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方纪《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初雪》，1957年批判宗璞《红豆》，邓友梅《在悬崖上》，丰村《美丽》，陆文夫《小巷深处》，刘绍棠《田野落霞》、《西苑草》，到后来又批判萧平《除夕》、刘真《英雄的乐章》，都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帽子。在那个时代文艺作品一旦被扣上这两顶黑帽，就万劫不复。甚至表现革命队伍中互相关爱的阶级情、父女情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也被认为是因为描写了“永恒的人类之爱”而褻渎了革命，因而发生了问题。20世纪60年代，我还是中学生，学校组织我们批判

“毒草”电影《舞台姐妹》、《早春二月》。那是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看了电影心里觉得挺好的，可再去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上的大块文章，正连篇累牍地批判电影《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呢。电影中对林老板的同情，萧涧秋对文嫂、小红的救助，竺春花与邢月红的姐妹情，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扬“阶级调和论”。林老板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萧涧秋是“革命队伍的逃兵”，邢月红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主义者”，这些电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样的罪名是够恐怖的。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切优秀文艺作品都被扣上这两个罪名。那时，现实关系和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情都遭绞尽杀绝，在阶级的、“革命”的幌子下兽性、非理性大暴发。

在理论界，也曾有秦兆阳、巴人（王任叔）、王淑明、钱谷融、何其芳等轮番亮相，都是以对人性、人情的思考而显示出对人文主义与人学精神的坚守。他们在理论界挺身而出，质疑、挑战极“左”的阶级的、革命的人学观与相应的创作思想，终于一次次演出悲壮的一幕。而对他们的批判，以及十七年中对所有稍具探索意味的作品的批判，都是扣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帽子为最具杀手锏的讨伐。

也因此，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的发轫之作《班主任》、《伤痕》，就是以对人性的严峻思考而迸发出凌厉的批判锋芒。紧接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篇篇人性探索之作纷纷问世。1983年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理论讨论，将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提升至紧张的顶点，20世纪绵延数十年的两种人学思想的碰撞、冲突激发出最后一轮白热化的激荡。

我在最近一篇表述我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看法的文章《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学术月刊》2008 年第三期）中写道：

什么是贯穿与推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

一句话，就是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的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拥有与享有什么？我们应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从本质上说，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进程，就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与认识自我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自我如何协调、平衡、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历史进程。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不断发展、嬗变，演化成了人类的文明史与人类发展史。

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观念的演变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发现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人类的目标。

人类对自我的发现与认识，也决定了文学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学之于新时期文学、文化,在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的发展中具有不可小视的革命性影响与意义。

今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30 年来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到今日文艺表现自我,文坛多元、繁荣格局,令我们这些过来人回首往事感慨系之。刘智跃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文学关系的论著出版,恰是对于 30 年新时期文艺一个不可忽视方面的重要总结。

智跃来自湖湘,是热血青年,性情中人,有湖南人的血性,冲动,侠义。他有灵气,时发出人意外的精彩之论。他毅然接受了这个看似容易实艰深的任务,收集资料虽然不算困难,但是提升到理论探讨却颇需功力。智跃的论文高屋建瓴,从生命观和主体观两方面的突出和发展转变中深入揭示其特色。从文学是人的观念的表现来说,阐释新时期精神分析小说冲击了传统伦理人和阶级人的观念,突出了个体生命的寻觅和追求。它以观念的更新影响了小说的主题,建构了具体的文学形态。新时期精神分析小说在关注生命、探索奥秘、启蒙社会和思考主体、扣问文化、反思现代性等方面作出了艺术探索和不倦的价值寻求。智跃的这篇论文揭示出新时期精神分析小说还具有浓烈的现实指向意义,包括现实关注、政治干预和社会参与功能。他还阐释了新时期文学受精神分析学说影响,在将理论经过在地性转化后,融合了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达到了将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化和转化,因而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指向和艺术特色。这是有见地的。

智跃与卢炜、曙豪、腊生等七子与我情谊甚笃,三度春秋,他们融入了我的人生,我的妻子也受他们的感动,因此写了好几篇散文,太湖之滨、兰亭曲水也曾留下我们寻访的足迹。但是他

8 颓圮的边界与生命的回响——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小说

们终于学成归去，令我怅然若失。智跃回到他的湖湘大地，我明白那里有他的精魂所系与生命活力之源，他的跃动的生命会绽放出灿烂的智慧之花。

苏州读万卷堂

2008年5月9日

目 录

序言	(1)
----------	-----

绪论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文学语境	(1)
-------------------------	-----

第一章 新时期精神分析文论的译介传播	(16)
一 精神分析理论著作的翻译情况	(17)
二 精神分析学家生平传记译介	(21)
三 介绍评述著作	(23)

第二章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	(30)
第一节 文学观念变革：出发与回归	(32)
第二节 创作心理审视：回溯与探幽	(41)
第三节 心理批评：重释与再造	(49)
一 心理—社会批评	(50)
二 人物心理批评	(53)
三 象征批评	(56)
四 症候式分析	(58)

第三章 感性生命：张扬与迷茫	(64)
----------------------	------

2 颓圮的边界与生命的回响——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小说

第一节 生命之光与文学之源	(67)
第二节 性压抑与变态生命观	(82)
第三节 性偏至与本能生命观	(102)
第四节 性反抗与政治生命观	(125)
 第四章 无意识主体：回归与失落	(144)
第一节 无意识探求与主体审美	(145)
第二节 个体与边缘	(160)
第三节 集体与象征	(178)
第四节 语言与分裂	(195)
 第五章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中国小说的美学新质 ...	(216)
第一节 美学现代性	(217)
第二节 无意识与潜本文	(228)
第三节 心理叙事美论	(240)
 主要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57)

绪 论

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文学语境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历史时段被称为“新时期”，相应地文学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①，它之“新”，表现在文学理论思想来源、文学创作语境和具体创作形态等各方面。作为决定文学创作和作家精神主体面貌等重要方面的文学语境，对我们考察精神分析文论影响、传入、接受和中国精神分析小说创作的兴衰更替具有重要意义。

以政治事件为前导的 1976 年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化性的，在政治宣告历史某些方面的正当性已然丧失之时，文化充当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手段，政治革命必须以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为巩固政权的舆论前提。1978 年，中央决定文联和各协会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②，以取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相应政治写作班子，新时期文化建设揭开序幕。有此前提，作为“社会意识形态”^③之一的文学艺术受到重视是可以预料的。《中国文

① 朱寨、洪子诚把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定在 1979 年，陈思和定于稍早的 1978 年，但实质上他们的差别并不大，朱、洪的看法是充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陈则从文学走向的趋势上发现了文学整体变革前内在精神的成熟。

② 《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人民日报》1978 年 6 月 8 日。

③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0 页。

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就是这样认定文学的作用的：“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① 由于政治变故，此前赋予文学及其相关各种规定性的所有基本预设，从此不再被视为当然，这使得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在结构上，成为可能。正如周扬所展望的：“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②

但是也要看到，由政治引领文学的做法是当代政治和文学的传统关系，并非新时期首创。这种做法向来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使得一种性质的文学由于意识形态的培养能够迅速成长，短时间内繁荣起来；另一方面，文学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由于这个传统在新时期之初不但没有受到反思，反而还被有意加强，以作为抵制“文化大革命”文学恶劣影响的筹码。新时期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摆脱传统思维模式，这是一道很奇特的景观。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说：“群众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一部分作品的反映是：政治上是反对‘四人帮’的，艺术上是模仿‘四人帮’的。”对新时期之初文学，政治无形之中依然是悬在文学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考察新时期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重大论争，包括理论争论和创作争鸣，我们均不可回避历史的这种本来事实。因此，政治和文学的向背之复杂关系仍然是我们考察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语境。这种向背之所以形成亦有其深刻的思想前提。

从思想角度来说，贯穿整个80年代且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汪晖说：“在整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

① 《人民日报》1978年6月8日。

②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富活力的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思潮。”^① 它的提倡者之一李泽厚曾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来概括五四运动的精神内质并延伸出其当代形态。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历史境遇的特殊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只完成了后者而遗漏了前者。因此他主张新时期应该继续“五四”未竟的任务，倡导“新启蒙主义”。

为了思想的除旧布新，宣扬贯彻新的话语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运动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引入新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层面。新资源进入后人们对它进行在地性转化、解读和运用，又是一个层面。在两个层面之间，尤其是在主体认识层面上与原有理论之间产生的结构性距离，使得引入的西方思想资源在新时期的接受过程中经历了若干错位的过程，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和关系。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和精神分析小说创作的情况同样应作如此观。

鉴于人们把新时期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封建主义影响的基本认识，新启蒙主义者引进来自西方的理论资源是要用它来批判现实思想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的封建主义因素，所以他们“直接地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的灵感”^②。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新启蒙主义者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预设，掩盖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的现代性质，其价值追求与几乎同时进入新时期的现代派文学思想资源所吁求的文化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换句话说，‘新启蒙主义’的政治批判（国家批判），采用了一种隐喻的方式，即把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

①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喻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这种隐喻方式的结果就是：把对中国现代性（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反思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从而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困境也是整个‘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① 这种价值错位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局面。

卡林内斯库指出：“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是“分裂”的，“关于前者，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我们可以说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② 仔细分析，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需要民主和理性方面的现代性思想资源与认识论，而现代派文艺是美学现代性意义上的文艺形态，两种现代性是分裂和矛盾的关系。在中国作家的观念中，它们却是一致的：“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③ 结果，这样一种主观上是追求现代性的价值行为，由于吸取的是美学现代性的资源而导致其本身包含了诸多悖论。作为一次自觉的思想兼文学运动，它首先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遭遇尴尬。这次运动第一次暴

①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②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8页。

③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